

# 文学研究

## 方法论讲义

◎ 赵敏俐 编著

二十世纪文学研究经典论文选目次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王国维：人间词话

王国维：唐宋大曲考

梁启超：情圣杜甫

梁启超：汉魏时代之美文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陈寅恪：韦庄《秦妇吟》校笺

胡适：红楼梦考证

郭沫若：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

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的转变

闻一多：伏羲考

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

吴宓：诗学总论

郭绍虞：文学观念与其含义之变迁

朱光潜：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

杨公骕：商颂考

學苑出版社

# 文学研究方法论讲义

赵敏俐 编著

学苑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研究生精品课程教材  
北京市属市管高校人才强教计划资助项目成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研究方法论讲义/赵敏俐编著. -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  
ISBN 7-5077-2597-9

I. 文… II. 赵… III. 文学研究-方法论-中国 IV. 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2587 号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100079

网 址: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public.bta.net.cn

邮购电话:010-67601101

销售电话:010-67675512、67602949、67678944

印 刷 厂:北京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787×1092 16开本 17.875印张

字 数:450千字

版 次:2005年12月北京第1版

印 次:200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0001—1000册

定 价:30.00元

# 目 录

|                           |     |
|---------------------------|-----|
| 导论 文学研究方法论的提出与课程设置 .....  | (1) |
| 一、文学研究方法论的提出及其意义 .....    | (1) |
| 二、文学研究方法论课程的开设及相关介绍 ..... | (3) |

## 二十世纪文学研究方法论概述

|                                |      |
|--------------------------------|------|
| 第一章 二十世纪文学观念的变革及其方法论意义 .....   | (5)  |
| 一、中国古代的“文”与“文学”观念 .....        | (5)  |
| 二、“五四”前后关于“文学”概念的科学探讨 .....    | (6)  |
| 三、文学观念的变化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 .....      | (8)  |
| 第二章 二十世纪初以进化论为基础的实证主义方法论 ..... | (14) |
| 一、对清人治学方法的简单总结 .....           | (14) |
| 二、二十世纪初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 .....         | (16) |
| 三、以进化论为指导的考证法的历史局限 .....       | (19) |
| 第三章 二十世纪古典文学研究方法论的主流 .....     | (21) |
| 一、分析主义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 .....          | (21) |
| 二、社会分析法在文学研究中的地位和意义 .....      | (23) |
| 三、形而上学与社会学分析法的历史局限 .....       | (28)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文学研究方法论的新发展 .....    | (30) |
| 一、文学研究方法论热的产生及历史渊源 .....       | (30) |
| 二、以文化学为基础的系统方法论发展的历史趋向 .....   | (31) |
| 三、二十世纪末方法论热的消退及相关思考 .....      | (31) |
| 第五章 有关文学研究方法论著作简介 .....        | (38) |
| 后记 .....                       | (44) |

## 附录 二十世纪文学研究经典论文选

### 1、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附：陈梦家《由实物所见汉代简策制度》（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历史学·中国古代史卷上册，2000）

张锡厚《关于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整理的若干问题》（《文史》第十五辑，1982）

饶宗颐《从郭店楚简谈古代乐教》（《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胡平生、韩自强《阜阳汉简〈诗经〉简论》（《文物》1984年第8期）

谭家健《〈唐勒〉赋残篇考释及其他》(《文学遗产》1990年第2期)  
赵敏俐《20世纪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文学前沿》第2辑,2000)

## 2、王国维:《人间词话》

附: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朱光潜《诗的境界——情趣与意象》(《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选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钱钟书《通感》(《七缀集》(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詹安泰《论寄托》(《詹安泰词学论稿》,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叶嘉莹《人间词话境界说与中国传统诗说之关系》(《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 3、王国维:《唐宋大曲考》

附:游国恩《屈赋考源》(《游国恩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  
孙楷第《元曲新考》(《沧州集》,中华书局)  
郑振铎《宋金元诸宫调考》(《文学年报》,1932)  
钱南扬《宋元南戏考》(《燕京学报》第7期,1930)  
向达《敦煌俗讲考》(《燕京学报》第16期,1934)  
陈多《戏史何以需辨》(《戏史辨》,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

## 4、梁启超:《情圣杜甫》

附:李长之《文学史上之司马迁》(《文潮月刊》第一卷第5、6期)  
林庚《诗人李白》(《光明日报》1954年10月7日)  
叶嘉莹《陶渊明》(《汉魏六朝诗讲录》,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侯思孟《曹植的神仙思想》(《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 5、梁启超:《汉魏时代之美文》

附:铃木虎雄著、陈延杰译《五言诗发生时期之疑问》(《小说月报》17卷5号)  
罗根泽《五言诗起源说评录》(《河南大学文学院季刊》第1期)  
古直《汉诗研究·古诗十九首辨证、苏李诗辨证》(启智书局,1933)  
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考证》(中华书局,1955)  
李炳海《〈古诗十九首〉写作年代考》(《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赵敏俐《论班固的〈咏史诗〉与五言诗发展成熟问题》(《北方论丛》1994年1期)

## 6、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附: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燕京大学哈佛燕京社刊印,1945)  
王瑶《文人与药》、《文人与酒》(《中古文学史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程千帆全集》第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王水照《北宋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的关系》(《文学遗产》,1994年第3期)  
赵敏俐《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 7、陈寅恪:《韦庄〈秦妇吟〉校笺》

附:郭绍虞《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文学年报》第1期,1932)

唐圭璋《云谣杂曲子校释》(《文史哲季刊》第1卷1期,1943)

夏承焘《姜白石词谱的读译和校理》(《白石诗词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高亨《周代大武乐考释》(《文史述林》,中华书局,1980)

邓小军《陶渊明在晋宋之际的政治态度——陶渊明〈述酒诗〉补正》(《诗史释证》,中华书局,2004)

## 8、胡适:《红楼梦考证》

附: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观堂集林》卷11,中华书局,1959)

浦江清《屈原生卒年月日的推算问题》(《浦江清文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自序》(《燕京学报》第7期,1928)

孙望《王度考》(《学术月刊》,1957)

唐圭璋《柳永事迹新证》(《文学研究》,1957)

陈贻焮《李商隐恋爱事迹考辨》(《唐诗论丛》,1980)

## 9、郭沫若:《从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

附:孙作云《从〈诗经〉中所见的西周封建社会》(《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66)

侯外庐《司马迁著作中的思想性与人民性》(《人民日报》1955年12月31日)

吴组缃《论贾宝玉典型形象》(《北京大学学报》,1956年第4期)

褚斌杰《〈诗经〉中的周代天命观及其发展变化》(褚斌杰《古典新论》,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

郭英德《关剧文化意蕴发微》(《戏曲研究》第30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

## 10、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的转变》

附:浦江清《八仙考》(《浦江清文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游国恩《论陌上桑》(《游国恩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

冯沅君《古优解》(《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

董每勘《说“傀儡”》、《〈说“傀儡”〉补说》(《说剧》,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郑振铎《净与丑》(《中国文学研究》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 11、闻一多:《伏羲考》

附:苏雪林《〈九歌·河伯〉与古代河神祀典之关系》(《现代评论》,204期)

郑振铎《蝴蝶的文学》(《海燕》,上海新中国书局,1932)

孙作云《诗经恋歌发微》(《文学遗产增刊》第5期,1957)

桀溺《牧女与蚕娘——论一个中国文学的题材》(《牧女与蚕娘——法国汉学家论中国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傅道彬《兴与象——关于原型的古老诠释》(《晚唐钟声》,东方出版社,1996)

## 12、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

附:程千帆《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

龙榆生《两宋词风转变论》(《词学季刊》二卷一号,1934)

王水照《苏轼豪放派的涵义和评价问题》(《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2期)

黄天骥《元剧的“杂”及其审美特征》(《文学遗产》,1998年第3期)

### 13、吴 宓:《诗学总论》

附:陈寅恪《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0年第2本第2分本)

尧、子《读〈西厢记〉与 Romeo and Julie》(《光华大学半月刊》第四卷第2、3期,1935)

吴熊和《高丽唐乐与北宋词曲》(《中华文史论丛》第50辑,1992)

叶维廉《道家美学、中国诗与美国现代诗》(《中国诗歌研究》第2辑,2003)

曹 旭《诗品东渐及对日本和歌的影响》(《文学评论》1992)

王小盾《越南俗文学文献和敦煌文学研究、文体研究的前景》(《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 14、郭绍虞:《文学观念与其含义之变迁》

附:汤用彤《魏晋玄学和文学理论》(《中国哲学史研究》1980年第1期)

钱钟书《诗可以怨》(《文学评论》1981年第1期)

罗宗强《唐代文学思想发展中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5期)

吴承学《辨体与破体》(《文学评论》1991年第4期)

左东岭《从良知到性灵——明代性灵文学思想的演变》(《南开学报》1999年第6期)

### 15、朱光潜:《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

附:程千帆《中国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程千帆全集》第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王运熙《论六朝清商曲中之和送声》(《乐府诗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高友工《律诗美学》(《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宇文所安《情投“字”合:词的传统里作为一种价值的真》(《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曾永义《元杂剧体制规律的渊源与形成》(《台大中文学报》,1989年第3期)

吴相洲《论永明体的出现与音乐之关系》(《中国诗歌研究》第1辑,2002)

### 16、杨公骥:《商颂考》

附:李炳海《部族文化与先秦文学·导言》(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

许志刚《〈诗经〉与周代的礼乐文化》(《诗经论略》,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

曲德来《屈原生平诸问题》(《屈原及其作品新探》,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

杨树增《汪元量祖籍、生卒、行实考辨》(《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赵敏俐《关于中国古代歌诗艺术生产的理论思考》(《中国诗歌研究》第2辑,2003)

姚小鸥《公莫巾舞歌行考》(《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

## 导论 文学研究方法论的提出与课程设置

随着当代学科建设的日趋分化,中国古代文学已经成为中国文学这一学科下一个相对独立的二级学科。面对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如何持续不断地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使之成为现代中国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其丰富的内容参与现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已经是学者们早就思考的重要问题。同时,随着高等学校研究生教育的大发展,要培养出一批批优秀的研究型人才,使他们不仅具有扎实的基本知识,而且具有学术创新能力,也是当前大家关注的重要问题。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正是在这一大的文化与教育背景之下被提了出来,它成为当前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研究生教育所急需。因此,在高等学校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培养中开设“中国文学研究方法论”,并编写一部与之相配套的教材,自然就有了它的多重意义。

### 一、文学研究方法论的提出及其意义

严格讲来,只要我们研究文学,就要有一定的方法。所以,方法与研究本身是不可分割的。在中国古代,孟子曾提出过“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之说,这虽然不是就文学而言,但是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这却是最早被应用的基本方法。《毛诗》学派在研究《诗经》时曾提出了“风雅正变”之说,这也是在一种研究方法上得出的结论,或者说它里面就体现了一种研究方法。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首列“原道、征圣、宗经、辩骚、正纬”五篇,并认为这是为文之枢纽,其实这也是刘勰研究“文”所坚持的基本方法。中国古代学术有汉学、宋学、清代朴学之别,又有所谓义理之学和辞章之学之别,这不仅是学风的变革和学术流派的区分,其实也包含着研究方法论上的不同。

但是在文学研究中自觉地提出方法论的问题,自然还是上个世纪初开始的事情。就我所知,首先把它当成一门课来讲,应该始于梁启超。他于民国十年在天津南开大学任课外讲演,一学期后集成一书,名之曰《中国历史研究法》。此书的意义不仅在于历史研究,对于文学研究也具有同样的意义。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向来有文史不分之说,文学史的研究从广义上也属于历史的一部分。

1923年,王国维受清华学生会邀请作公开演讲时说:“古来之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现之金石书籍,于学术之大有关系者,尚不予焉。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sup>①</sup>王国维这种把纸上材料与考古发现之新材料结合运用的研究方法,被人称之为“二重证据法”,在二十世纪的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

<sup>①</sup>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王国维文集》第四卷,3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sup>①</sup>由此,可见当代人对于方法论问题之重视。梁、王、陈诸人在学术界的影响,不仅在于他们本身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同时包括他们在研究方法论方面给后来者的巨大启示。

具体到文学研究,大约在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有人写文章,如渭川的《怎样研究中国文学史》(见1923年《学生杂志》10卷7期);仲云的《一种研究文学史的新方法》(见1924年6月2—9日《学灯》);30年代时,李长之有《论研究中国文学者之路》(《现代》第五卷第3期)等。50年代,在如何编写文学史和文学研究的大讨论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探讨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进入80年代以后,文学研究方法论问题再度被提了出来,并先后出版了多部与之有关的著作。如王钟陵的《文学研究新方法论》、钟优民的《文学研究方法论》、周勋初的《当代学术研究思辨》、张伯伟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陶东风的《文学史哲学》等书,以及叶维廉的《中国文学批评方法略论》等文章。由此可见方法论问题的重要以及学人们对它的重视。

方法论,严格来讲应该属于哲学的范畴。所谓文学研究方法论,也就是从哲学的角度寻找一种文学研究的方法。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以为首先要弄清以下三点:第一要弄清“文学是什么”,这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仔细考察我们就会发现,不同的时代对于“文学”的定义是不同的。“文学”这一名称,最早见于《论语·先进》,所谓“文学子游子夏”,它指的是文章博学,即对所有文献经典的学习。直至辛亥革命前,章太炎作《国故论衡》,首先为文学正名,还这样讲:“文学者,以有字文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可见,这时的文学还是一个经史子集无所不包的概念,对文学的研究自然也包容于对经史的研究中。而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则是“五四”以后逐渐形成的一个新概念。由于对它的定义不同,相应的“文学”研究对象自然也会跟着改变。第二要弄清“什么是文学研究”,这是历史观的问题。也就是说,在这一层面中,我们首先要认识的是在“文学”研究中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要达到什么目的。根据要解决的问题和达到的目的,我们自然会选择不同的理论工具,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心理分析、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原型批评等等。这些不同的理论是我们进行学术研究的基本思想武器,正确的使用各种理论,是我们解决问题达到文学研究目的基本途径。第三要弄清如何对它进行研究,也就是具体的方法问题。如搜集资料、整理、考辨、运用史料的方法;比较、分析、归纳、总结、假设与证明等逻辑学的方法;以及宏观与微观、系统与分类、具体与抽象、个别与一般等哲学辩证法等。具体的研究方法在文学研究中是不可缺少的,这是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手段和前提,无论进行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可能离开。以上三个问题的解决,既与各种哲学思潮与文学研究理论的发展有关,又与不同时代的社会变革与研究者们所从事的社会实践相联系。我们常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其实我们还应该认识到,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每一个时代的学术,都是在一定的哲学文化思潮的影响下产生的,也都是在这一特定的时代研究方法下进行的。我觉得,我们要学习文学研究方法论,首先要认清这一点,然后才是为自己寻找一种新方法的问题。

方法是研究的工具,由于研究的对象、研究的目的不同,所使用的方法也不同。世上没有一把万能的钥匙可以打开所有的锁,也没有哪一种方法可以在所有的文学研究中都适用。当我们对文学作品进行艺术分析的时候,用考据学的方法显然行不通。要认识作者所处的时代,原型批评的方法也不适用。所以,我们在这里所谈的是方法论,而不仅仅是方法。除了要掌握具体的研究方法之外,我们还要在“论”的方面下工夫。这里所说的论,就是通过学习和实践,

---

<sup>①</sup>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发现方法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辩证关系,面对不同的研究对象,找到切实有用的研究方法。但同时,在不同的研究对象和不同研究方法的使用过程中,又有一些不变的东西,如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真理的原则。科学的首要目的是求真,这是永不改变的。

## 二、文学研究方法论课程的开设及相关介绍

本门课程的讲授对象主要是二年级的硕士研究生和刚入学的博士研究生,是为了让研究生在进入学术研究之前就懂得方法论的重要性,学习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基本知识,了解什么是文学研究方法论,方法论在文学研究中的意义,如何自觉地利用各种研究方法来解决学术问题,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等等。具体来讲,全部讲课内容又分为两个大的方面;第一是了解中国文学研究方法论发展的历史,尤其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变革以及其与时代发展变化之间的关系。第二是对20世纪优秀学者的经典性学术论著进行方法论分析,了解现当代著名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时所使用的不同方法以及其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其中尤以第二部分为学习和讲授的重点。

我只所以要把第二部分作为学习和讲授重点,基于以下两点考虑:第一、目前学术界有关学术研究方法论的著作已经有多种,相关的文学理论著作和哲学著作更多。这方面要讲述的内容其实是很丰富的。但是,方法论本是一门抽象的理论,它的主要目的是要用来指导实践。如果脱离了实践而讲方法,这方法就成了不切实际的空谈。所以,对于这些研究方法论的相关著作,我只进行一般性的简单介绍,提供学习书目,学生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课外阅读。而我则把本门课的重点放在结合具体的研究实践来讲述方法上面,仔细分析每一个科研案例,看它们究竟使用了何种方法,又是如何使用的,才会让同学们真正理解方法论的内涵。第二、对于硕士研究生来讲,他们正处于研究入门的学习阶段,他们还没有自己的研究实践,对于治学的甘苦还没有什么体会,只讲方法而不讲作品,他们照样不能体会每一种方法论的要义。而对刚入学的博士研究生来讲,他们面临着博士论文的选题和写作,同样需要在方法论实践上的指导。因此,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用案例分析的方法来讲方法论,也是本人在几年来讲授这门课程中总结出来的一点经验。

本讲义中所选录的,都是20世纪以来著名学者的经典性著作和论文,共分为十六讲。每讲选讲一篇正文,同时提供5至6篇附录。在选录的过程中,我力求每篇正文都代表一种方法,或者在学术研究中代表某一个方面。正文的入选作者均是20世纪以来某种研究方法或研究方向上的开创者,在相关的学术领域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其中像王国维、陈寅恪等人,更是世所公认的学术大师。附录也大都选取本领域内著名学者的代表性论著,这里既有老一代学者的文章,也有中青年学者的文章,同时,还选录了港台、海外学者的部分文章,以显现其内容的多样性。正文与附录之间,或者有方法论意义上的联系,或者在研究对象方面有某种关联,甚至还有研究方法和学术观点上的对立。通过正文和附录,我们可以看出某种方法在20世纪演进的历史和取得的成绩。同时也告诉同学们,方法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候面对大致相同的研究对象,不同的人也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通过正文与附录的学习,让同学们对于20世纪的学者们的治学与研究方法有所了解,对于20世纪方法论的演进以及不同的学术流派也有所熟悉,初步掌握运用方法论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另外还有一个目的,是想让同学们通过正文和附录的学习,了解20世纪的学术发展历史,了解20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都取得了哪些突出的成绩。因为无论正文和附录中所选的文章,大都是一个世纪以来的古代文学研究中的经典之作,都是每一个有志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必读的论著。对这些经典性论著的学习,本身就应该成为研究生的一门必修的学业。

鉴于本课程的特殊性质,在讲授的过程中我也试图采用比较灵活的方式。它大致分为两大部分,第一是老师对基本问题的讲授;第二是老师与同学们一起对经典性学术论著的研读和讨论。在研读和讨论之前,我要求学生们事先作好预习,要注意准备和解决以下问题:1、对每篇文章的作者其人、其事要有一个初步了解;2、本篇文章是在何种背景下展开研究的(包括前人的研究动态、作者写作此文的学术动机、目的、当时的学术环境、学术思潮等)?3、本篇文章的精义在何处,主要学术贡献是什么?4、文章主要运用了哪些方法和理论,以哪种方法与理论为主?5、作者的学术理念是什么?其学术思想有哪些特点?6、本文中主要使用了哪些材料,材料出自何处(包括正史、野史、会要、年谱、笔记、文集、铜器铭文、甲骨文、简帛、图片、碑刻、各种现存实物、考古实物、田野调查、录音录象等等);7、本篇文章在写作上有哪些特点,语言风格如何,体现了什么样的学术风格?8、本篇文章有哪些不足之处,等等。在课前准备的基础上,每一次课选择一篇经典范文,由一位同学主讲,然后同学们集体讨论,再由老师总结。为了使讨论能够充分展开,除了主讲的同学之外,我要求所有的学生在课前必须认真研读每一篇文章。我觉得,这种学习方式还是比较好的,首先,上课的过程就是经典范文学习的过程,让学生有机会接触学术大师的研究成果以及相关知识。其次,它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每一篇范文的研讨,既是同学们的知识学习,也是一次登上讲台的实践。最后则让学生进行一次严格的学术论文的写作训练。

总之,我的目的是,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既要让学生们了解20世纪文学研究方法的历史进展,又要让他们了解前辈学者不同的治学方法和各自取得的学术成就;既要让这门课程成为一门理论课,又要让它成为一门实践课;既要让学生们在研究生学习过程中从一开始就有一个较高的理论认识起点,又要让他们养成不尚空谈的严谨务实的学风。其实,这不仅是对学生们学习这门课程的期待,同时也是我自己不断学习的过程。我虽然已经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多年,但是在文学研究方法上仍然需要不断地学习和探索。每一次回顾前辈大师的学术事迹,重温他们的经典性研究文章,就深感自己的不足。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曾用这样的话来表达他对孔子的敬仰之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我觉得这话很能表达我对人生的最高的治学境界的渴望,也很能表达我对前辈学术大师们治学成就的敬仰,同时也愿意用它来与同学们共勉。

## 第一章 二十世纪文学观念的变革及其方法论意义

要讨论文学研究的方法,首先要搞清什么是“文学”。这一问题看起来很简单,其实要对它进行明确的界说并不很容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们对它会有不同的理解;而在这种不同理解的背后,则孕含着一种深刻的社会文化思潮。因此,一种文学观念的改变,也往往是一个时代学术思潮变革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一个时代文学研究方法变革的基础。20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变革,正是建立在“五四”前后关于文学本质问题的探讨这一基础之上的。站在又一个世纪之初的今天,当我们在讨论文学研究方法论的时候,首先来看一看上世纪之初关于文学本质问题的讨论,对于深化新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学好文学研究方法论这一门课,是十分重要的。

### 一、中国古代的“文”与“文学”观念

要探讨上个世纪学人关于“文学”本质的理解,我们先应该回顾一下中国古人的文学观。“文学”这一名称,最早见于《论语·先进》“文学子游子夏”一语中。这里所说的“文学”,本是孔门四科之一,它指的是文章博学,即对所有文献经典的学习。文学这一意义,在汉代还在沿用,如《汉书·武帝纪》元朔十一年诏曰:“选豪俊,讲文学”。至于略近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文学”概念,古代则单称之为“文”。“文”字在甲骨文中写作“𠂔”、“𠂔”,其字形“象正立之人形,胸部有刻画之文饰,故以文身之纹为文”。<sup>①</sup>《说文解字》曰:“文,错画也。”《广雅·释詁》曰:“文,饰也。”是文的本义指文采和文饰,《说文》和《广雅》两书正好从形象和功用两个方面对此字做了完整的解释。因为其本义指人胸部纹饰,故此字一出现就带有审美意义,在甲骨文中“冠于王名之上以为美称”。<sup>②</sup>由此引而申之,“文”字可指一切有文采的东西。《周易·系辞下》曰:“物相杂,故曰文”,《礼记·乐记》又曰:“五色成文而不乱”。故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铉;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

由此可见,中国人很早就认识了文学所具有的那种形式上的审美艺术特色,由日月垂象的天之文,山川焕绮之地之文,以及旁及万品的动植皆文,推而广之到人心感于物形于语言的声音,见诸文字的表现,就是人之文。

中国人虽然很早就认识了文的这种艺术形式美,可是却没有继续从文学的本质方面进行更深入的探讨,而是把凡是人类用语言文字写成的东西都称之为“文”,因而形成一种泛文学观。所以,在号称体系最为完备的古代文学理论著作——刘勰的《文心雕龙》里,它所论述的

①见董作宾:《小屯·殷虚文字乙编》六八二〇;郭沫若等:《甲骨文合集》三六五三四。

②见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996页。

“文”除了我们今天可称之为文学的“诗”、“乐府”、“赋”等之外,还包括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谑、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17类30多种文体,这些,大都不能算在今日我们所说的“文学”之列。

也许,古人对于这种关于“文”的提法也觉得过于宽泛,故六朝时又有文笔之分。刘勰在《文心雕龙·总术》中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直至清人阮元,仍坚持这一说法,把无韵者称之为“直言之言,说难之语”,把有韵者才称之为“文”,并把传为孔子所作的《周易·文言》一篇看成是千古文章(文学)之首。但是这里的“文”仍然不能等同于现代我们所说的“文学”。

正因为古人有这种模糊的文学概念,所以也就不能建立一个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这一学科。尽管这并不妨碍中国人千百年来仍然不断地进行着文学创作,并继续产生了大量的优秀作品,但是这种关于“文学”的研究却是相对薄弱的。直至辛亥革命前,章太炎作《国故论衡》,首先为文学正名,还这样讲:“文学者,以有字文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可见,这时的文学还是一个经史子集无所不包的概念,对文学的研究自然也包容于对经史的研究中。在这个时期,由于受外国学术的影响,中国人也开始了文学史的研究和编写,代表作如黄人的《中国文学史》,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但由于当时中国人对文学这一概念并没有进行现代化的梳理,所以他们的文学史仍是一个经史子集无所不包的体系。

## 二、“五四”前后关于“文学”概念的科学探讨

随着历史与科学的进步,20世纪的中国学人显然不会再把自己的研究停留在传统的思维框架中。在西方现代学术思想的感召下,自本世纪初开始,一些有识之士便开始了关于文学观念问题的新的思考。

在这一思考过程中,王国维显然是个开风气的人物。他在《国学丛刊序》中说:

学之义广矣,古之所谓学,兼知行言之;今专以知言,则学有三大类:曰科学也,史学也,文学也。凡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法理者,谓之科学。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至出入二者间而兼有玩物适情之效者,谓之文学。

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前者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为主,后者则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的态度也。……要之,文学者,不外知识与感情交待之结果而已。

由这段话看,王国维对文学本质体悟很深,他试图要从科学、历史与文学的差别角度给文学下一个定义。尽管他给文学下的这个定义还不明确,应该说,这种对于文学本质的认识,从思想深度上看是远远超过了章太炎的。

在关于文学本质问题的探讨中,王国维之后,另一个重要人物是谢无量。1918年,谢无量出版了《中国大文学史》,在这部书第一篇的绪论中,第一章的题目就是《文学之定义》,在这里,他首先考察了“中国古来文学之定义”,又考察了“外国学者论文学之定义”,最后他认为,在中外学者中,只有英国学者庞科士(Pancoast)在他的《英国文学史》中所下的定义最好:

文学有二义焉。(甲)兼包字义,统文书之属,出于拉丁语 *Initera*。首自字母,发为记载,凡可写录,号称书籍,皆此类也,是谓广义,但有成书,靡不为文学矣。(乙)专为述作之殊名,惟宗主情感,以娱志为归者,乃足以当之。文学虽不规规于必传,而不可不希传,

故其表示技巧,同工他艺。知绘画音乐雕刻之为艺,则知文学矣。文学描写情感,不专主事实之智识。世之文书,名曰科学者,非其伦也。虽恒用历史科学之事实,然必足以导情陶性者而后采之。斥厥专知,擷其同味,有以挺不朽之盛美焉。此于文学,谓之狭义,如诗歌、历史、传记、小说、评论等是也。<sup>①</sup>

这是中国人在自己的文学研究著作中第一次明确地表示接受外国人的文学定义,但这种接受并不是盲目的,而是在同中国传统的文学观以及外国诸多文学观之中的择善而从,这里实际已经包含着他们对于文学本质的理性思考。尽管谢无量在这里还没有提出自己的文学定义,他的《中国大文学史》中还包括经学、文字、史学方面的东西,可是他毕竟强调了文学导情陶性的方面,特别指出了对文学要做“精神上之观察”,要注意文学的“美的特质”,这样明确的理论主张,比起王国维来又有了发展。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民主”和“科学”,在科学精神的感召下,“五四”学人对文学的本质问题开始了更为深入的探讨。1919年,罗家伦在《新潮》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什么是文学?——文学界说》的文章,就明显地表现了这种理性的思考。他在这篇文章的开头就说:“现在我们常常听得‘文学!’‘文学!’‘保全旧文学!’‘创造新文学!’的声浪了。但是什么是文学呢?不但读者心里常常有这个疑问,就是我心中也常常有这个疑问。我去问保全旧文学的人,他说:‘文学就是文学,何须你问。’我去看创造新文学的书,书里也还是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于是,他就先看一下中国古人是怎么说的,为此他查找了桓谭、应璩、陆机、李充以至刘勰和章学诚的文章,结果发现谁也不曾“爽爽快快下一条文学界说”,原来“中国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浑浑沌沌,不愿有个明了的观念”,勉强地说,在中国近代史上,想给文学以一个明确界说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阮元,一个是章太炎。阮元说:“必沈思翰藻,始名之为文”,章太炎的说法已如上述。这些,显然也是比较宽泛比较模糊的,是罗家伦所不满意的。于是,他又广泛搜集了西方15家不同的说法,概括归纳,指出文学有以下八种要素:(一)文学是人生的表现同批评;(二)最好的思想;(三)想象;(四)感情;(五)体裁;(六)艺术;(七)普遍;(八)永久。最后他终于“用科学的方法,归纳出一个界说”:

文学是人生的表现和批评,从最好的思想里写下来的,有想象,有感情,有体裁,有合于艺术的组织;集此众长,能使人类普遍心理,都觉得他是极明了,极有趣的东西。<sup>②</sup>

罗家伦给文学所下的这个概念,在今天看来也许还不是那么完善,但是他为了做到这一点,却查找了大量的资料,并对古今中外五花八门的文学概念进行了一次认真的梳理和细致的分析,体现了“五四”学人那种求是科学的研究精神,它标志着20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开始从传统走进了现代,当代人的科学精神在文学研究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以概念的界定为基础,说明一种新的学术规范正在形成,一个新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也必将由此而开始诞生,它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在“五四”时期关于文学本质的探讨中,郑振铎在《文学周报》上发表的《文学的定义》是另一篇重要的文章。和罗家伦不同,郑振铎并不是在总结别人关于文学定义的基础上得出自己的结论,而是象王国维那样,从与科学和其它艺术门类的比较中来认识文学。他首先指出科学与文学二者的不同:文学是诉诸情绪,科学是诉诸智慧;文学的价值与兴趣,含在本身,科学

<sup>①</sup>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中华书局1918年版第4页。

<sup>②</sup>罗家伦:《什么是文学?》,《新潮》1919年第2期。

的价值则存于书中所含的真理,而不在书的本身。其次又指出文学和别的艺术的不同:文学是想象的,因此它与诉诸视觉的图画、雕刻等不同;文学是表现人们思想和情绪的,不仅是只表现情绪的,因此它与音乐又不同。最后他下的定义是:

文学是人们的情绪与最高思想联合的“想象”的表现,而他的本身又是具有永久的艺术的价值与兴趣的。<sup>①</sup>

严格来讲,郑振铎给文学下的这个定义并不比罗家伦强,他所讲的几点,罗家伦都已经讲到,而且比他讲的还要全面些。但二人不同的是,罗家伦虽然给文学下了一个较好的定义,可是他的文学研究却没有贯彻自己的理论主张。他在发表了《什么是文学》一年以后的一篇文章里,又提出了什么“华夷文学”、“策士文学”、“逻辑文学”等概念,显得有些不伦不类,因而不免受人批评。<sup>②</sup>而郑振铎在探讨文学本质的同时,把更大的精力都放到了文学的创作和研究上,他对于文学本质的实际把握还是超出了罗家伦的。

试图给文学下一个定义是五四以后以至于二三十年代的一种学术风气,一些著名的学者在他们的文学史著作中往往都是如此。如胡小石的《中国文学史讲稿》,在第一章《通论》中就首先考察了文学的意义和古代对它的一些解释,然后讲什么是文学,他分析了古代的一些说法,还引用了日本人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的说法,接着就给文学下了一个定义。<sup>③</sup>稍在其后出版的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在《绪论》里也是先谈“文学”,该书的第一句话就是:“治文学史,不可不知何谓文学。而欲知何谓文学,不可不先知何谓文。”接着就从什么是“文”说起,也给文学一个基本的界定。<sup>④</sup>

从王国维、谢无量到罗家伦和郑振铎、再到胡小石、钱基博等人,“五四”前后的中国学人基本上完成了对于文学本质问题的重新定义。和20世纪后的文学观相比,尽管这个定义看来还不很准确,还不是一个非常科学的概括,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们虽然看到了文学的艺术要素,看到了情感、想象等在文学中的地位,却还没有认清文学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特质,但是,从他们的这种探求中我们却看到了“五四”学人的科学精神。正是他们的这种探讨,促使“五四”以后的文学研究朝着科学化方向迈进。同时,它也直接影响“五四”以后的中国学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促进了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建立。

### 三、文学观念的变化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

“五四”前后的中国学人关于文学本质的探讨,是“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理论探讨的角度对中国文学进行了学科规范,建立了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科学体系,也有着文学研究方法论的意义,这其中有三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第一、“五四”学人在探讨文学本质时,首先把它从经学、史学、哲学等学科中分离出来,这种学术的规范化不但有助于文学研究的深入,而且也有力地推动了“五四”时期白话文学、平民文学和俗文学的创作与研究。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中,一直把诗文当成重点,

①郑振铎:《文学的定义》,《文学周报》第1号,1921年5月10日出版。

②罗家伦:《近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变迁》,《新潮》第二卷第五号,1920年9月出版。

③胡小石:《胡小石论文集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15页。按胡小石的《中国文学史讲稿》原版于1928年。

④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世界书局1933年版第1-4页。

“民间文学”一直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可是到了“五四”时期,这一切却完全变了过来。在那时学人看来,中国文学从周代的《诗经》开始,最有价值的不再是“雅”和“颂”,而是“国风”。汉赋以降的文人创作,如六朝的骈文、唐代律诗,特别是明清以来被人标榜的桐城古文,都成了毫无生命的“死文学”,而真正有价值的则正是那些难登大雅之堂的民间谣谚,是明清以来的戏曲和小说。这种适应时代变革的新的文学观念和新的文学研究热点的形成,因为有了“五四”学人关于文学本质的重新界定而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它使研究者可以堂堂正正地把这些俗文学、平民文学、白话文学摆上庄严的文学殿堂,使他们的研究和创作不再仅仅是一些时代变革者的深情呼喊,而且还有坚强的理论基础作为后盾。同时,也正是这两者的结合,才使“五四”前后的文学创作与研究不但结出了革命的硕果,而且也开创了本世纪文学研究的新天地,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翻看一下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资料室和北大历史系合编的《中国史学论文索引》即可看出,自“五四”运动前后至20年代末以前的中国文学研究论文,关于白话文学、平民文学、戏曲、小说、民间文艺方面的内容占一半以上。其中取得最突出成就的领域又是对于中国小说和戏曲史、特别是对于宋元以来的小说戏曲的研究,出现了一支声势颇为浩大的研究队伍,产生了一批20世纪最有成就的学者,一批20世纪最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著作。如被郭沫若称之为“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sup>①</sup>的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产生在这一领域;被后人推崇为“近代文学批评先声”<sup>②</sup>的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产生在这一领域。而胡适之所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的提倡白话文的学术研究的主要成就,引导了当代人学术研究方向的《白话文学史》等著作,也在这一领域。其它如张静庐的《中国小说大纲》(1920年)、陈景新的《小说学》(1926年)、范烟桥的《中国小说史》(1927年)、胡怀琛的《中国小说研究》(1929年)、吴梅的《中国戏曲概论》、佟晶心的《新旧戏曲之研究》(1927年)、贺长群的《元曲概论》(1930年)、曹聚仁的《中国平民文学概论》(1926年)等著作,也都在这一时代先后出版。此外,还有以胡适的《红楼梦考证》(1921年)、《水浒传考证》(1920年)、《三侠五义序》(1925年)、《宋人话本八种序》(1928年)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学术论文,也发表在这一时期。而郑振铎一人在20年代就发表过《中国小说的文类及其演化的趋势》(1929年)、《中国小说提要》(1925年)、《明代之短篇评话》等有关论文20多篇。<sup>③</sup>

第二、“五四”学人关于文学本质探讨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强调了文学的艺术审美性,这一点,也和“五四”前后的中国文学研究紧密相关。在这方面,如果说王国维以其天才的艺术领悟力,已经在《红楼梦研究》、《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史》的研究中开风气之先的话,那么“五四”学人经过科学的讨论,就把这种文学的艺术本质更加明确化了。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发现了罗家伦和郑振铎等人论述中的共同特征。罗家伦讲“感情”,讲“想象”,讲“艺术”,郑振铎也讲“情绪”、“想象”和“艺术”。世农在《文学的特质》一文中也说:“文学是(以文字作工具)人生的表现,要具有艺术的美,暗示的印象,永久性与普遍性和体裁的作品。”<sup>④</sup>,胡小石也说:“文学,是由于生活之环境上受了刺激而起的情感的反应,藉艺术化的语言而为具体的表现。”<sup>⑤</sup>

“五四”学人对于中国文学艺术美的重视,既是一种科学地研究文学,深化对于文学本质

①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沫若文集》第12卷。

②陈鸿祥:《王国维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1页。

③可参考《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和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等编《中国史学论文索引》上编下册。

④见1921年《学术旬刊》(《文学周报》)第3号。

⑤胡小石:《胡小石论文集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4页。

认识的态度,也是和当时提倡白话文的“文学革命”思潮紧密相关的。“五四”学人为什么要提倡白话文学呢?因为他们认为白话文学是最生动活泼的,最能表达人的情感的,最有艺术价值的文学。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所提出的三大主义,所要建设的“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通俗的明了的社会文学”,也就是“五四”学人对于白话文学艺术价值的评价。他们研究中国文学,也就是要发掘白话文学的不朽的艺术价值。如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就这样说道:

为什么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呢?这都由于文学的性质。一切语言文字的作用在于达意表情;达意达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学。那些用死文言的人,有了意思,却须把这意思翻成几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却须把这感情译为几千年前的文言。明明是客子思家,他们须说“王粲登楼”,“仲宣作赋”;明明是送别,他们却须说“《阳关》三叠”,“一曲《渭城》”;明明是贺陈宝琛七十岁生日,他们却须说是贺伊尹、周公、傅说。更可笑的:明明是乡下老太婆说话,他们却要叫他打起唐宋八家的古文腔儿;明明是极下流的妓女说话,他们却要他打起胡天游、洪亮吉的骈文调子……请问这样做文章如何能达意表情呢?既不能达意,既不能表情,那里还有文学呢?①

既然如此,“五四”学人研究古代戏曲小说等白话文学而重视对它们的艺术和美学方面的研究,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尽管这种研究还不是很深入、很系统,可是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史上却具有重要的意义。如胡适《白话文学史》中评汉乐府诗的活泼、纯真,写出了“真的哀怨”、“真的情感”;评古诗《江南可采莲》是“只取音节和美好听,不必有什么深远的意义”;评《陌上桑》是采用“天真烂漫的写法”;评陶潜是“自然主义的哲学的最好代表”,是“能欣赏自然的美”的“自然诗人的大师”。郑振铎评李后主的词也说:“好的诗词,情感必真挚,词采必美丽。如春水经流于两岸桃花,轻舸唱晚之境地中。读者未有不为其美景所沈醉的。”评李清照是中国古代少有的“真诗人中的一个”,“她的词都是从心底流出的”。② 同样,鲁迅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文学史略》(1926年油印,后改名为《汉文学史纲要》)中,评价屈原的作品是“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评价《庄子》是“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总之,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即他们在对中国文学进行批评时,都不再取法于传统儒家的正统教化观,而是注重文学本身的情感、技巧、趣味、意境等各个方面。有时话语不多,却有画龙点睛之效。

第三、由于有了这种新的文学观念,从“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其论述范围逐渐从古代的泛文学变成了具有现代意义的“纯文学”。

文学观念的变革,在二十世纪的文学研究所产生的影响中,最终体现在文学史的编写上。如果我们把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编写分成几个阶段的话,那么可以看出,在上世纪初,以黄人、林传甲等人为代表的文学史可算是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的文学史家基本上仍然坚持的是传统的泛文学观;第二阶段是“五四”以后到二十年代,这一阶段的文学史家除了编写了大量以“戏曲”、“小说”、“白话文学”为代表的个体文学史外,还写出了新的通史性的中国文学史。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家,基本上不再用传统的泛文学观念,而是根据自己对于文学的理解,各自创造新的体例。如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把平民文学和白话文学当成中国文学史的正宗,其它都排除在他的文学史视野之外。胡小石的《中国文学史》虽然只写了从上古到五代部分,但是

①见远流出版公司印《胡适作品集》(3)第58-59页。

②原文载《小说月报》14卷1号、3号,1923年1月、3月出版。